

·中国现代史研究·

《李顿文件》所见之李顿中国之行^{*}

金光耀 朱 利

(复旦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事变真相, 这是1930年代初远东危机中引人瞩目的一件大事。国联调查团团长江国人李顿在华期间, 给其家人写了大量信件, 并记有日记。李顿的这批私人文件总计约合中文80 000余字, 记载了李顿本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看法, 以及他与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和日本军政要人的会谈。与公开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相比, 它对了解国联调查团尤其是李顿的立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国联调查团 李顿

[中图分类号] K2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3)04-0100-008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决定派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事变真相, 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远东危机中引人瞩目的一件大事, 涉及到国联及相关列强对事变的态度和中日两国政府对国联的政策。国联调查团由英国人李顿(Victor Robert Lytton, 1879—1947)任团长。李顿于1932年3月14日从日本抵达上海, 此后赴南京、汉口、北平及东北各地调查, 并在6月底再赴日本逗留十余日, 返华后完成调查团报告书, 最后于9月5日离华。在此期间, 李顿给其家人写了大量信件, 并按行程记有“南京日记”、“汉口日记”、“北平日记”和“沈阳日记”。李顿的这批私人文件藏于李顿故居英国赫特福德郡内华斯庄园(Knebworth House, Hertfordshire), 均为手写稿。笔者在胡永宁女士帮助下, 获得信件54函, 约合中文60,000余字, 日记18篇, 约合中文20,000余字, 另有与日方会谈纪要一篇, 以及题为《满洲: 下一步》的手稿一篇。^①

《李顿文件》记载了李顿本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看法, 以及他与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和日本军政要人的会谈, 与公开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相比, 它对了解国联调查团尤其是李顿的立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拟对《李顿文件》中所反映的李顿在华活动及其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择其要者作一述评, 以对李顿中国之行有一具体且更深入的认识。

一、李顿对日本侵华的看法

国联调查团于1932年3月14日抵达上海开始在华活动时,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尽, 而伪“满洲国”已在日本的操纵下粉墨登场。李顿率团在华期间, 十分注重搜集日本在华战争行为的具体事实。国联调查团在上海逗留12日, 李顿会晤了各方人士, 包括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上海

[收稿日期] 2002-12

[作者简介] 金光耀(1954—), 男, 上海宝山人,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 利(1979—)男, 山东济南人, 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本文所论及的《李顿文件》由胡永宁女士(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国民政府外交次长胡世泽的女儿)从李顿故居抄录提供, 特此致谢。

^① 李顿在其信中提到他的日记是连续的, 因此他在华期间所记日记当不止这18篇。此外, 从其信中所述看, 对这一期间的一些重要会谈他也有记录, 但笔者只获得与日方会谈纪要一篇。

市长吴铁城、日本海军将领野村吉三郎、盐泽幸一及松冈洋右、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驻沪领事布鲁南，详尽了解一二八战事的情况。3月21日，调查团视察闸北、江湾等战区，日本方面刻意安排，企图掩盖其挑起战火及战争对上海的破坏。李顿在其给妻子的信中记叙了日本安排下对暨南大学的视察，“它想给我们留下日本人尊敬文化机构的印象，因为这些建筑物并无多大损伤。如果这样，那么其目的没有达到，因为这个地区有另外5所大学彻底被摧毁了。”在视察上海北站时，李顿特别关注日本军队对这一人口稠密地区的平民的战争行为，而日本方面则竭力掩饰，谎称日本军队并未向平民轰炸，李顿告诉他妻子他被这一谎言所“激怒”（李顿致其妻子的信，1932.3.21，以下简称信）。对1月28日晚上日军在虹口挑起的战争，李顿更是予以高度重视。他先后与上海警察局长、英国领事馆官员、在沪外侨等多次就此事会谈，从而发现日本对此事陈述中的“最弱之处”，因为这与事实大相径庭（信，1932.3.25.）。经过调查，李顿形成了自己对一二八战事的看法：“日本人和中国人都不是没有一点过错的，两者都没有告诉全部真相，但是毫无疑问中国遭到极大的冤屈。日本人已经挑起了战争，并且在不宣战的情况打得极其残酷。”（信，1932.3.24）

4月下旬，调查团抵达已在日本控制下的东北。在这之前，李顿已从英国使馆官员和其他目击者那里对九一八事变有了相当的了解：“洛瓦特·弗雷泽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到了沈阳，他说他确信指控中国人袭击铁路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日本人进攻沈阳是经过长期的预谋和精心的策划，铁路事件仅仅是发动战争的借口而已。他问过日本的军官，如果铁路被炸，为什么那天晚上从大连驶来的火车能准时到达沈阳。他们最初的答复是火车越过了那段炸坏的铁轨。当他反驳说这是不可能时，他们又声称火车到达前毁坏的铁路已修好了。然后他又追问，为什么第二天早上毁坏的铁路仍被拍照，他们全哑口无言！”（日记，1932.4.10）到达东北后，李顿强烈地感受到：“在南满地区，也就是说从大连到长春，我们实际上是在日本了。流通的货币是日本的，雇员是日本人，军队、官员、旅馆全部是日本人的。”（信，1932.5.9）正是基于亲身感受和实地调查，李顿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指明日本对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抱有一种精密预备之计划”，九一八事变即是实行了该计划，而“日方之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所谓的“满洲国”若无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文武官员的活动，“决不能成立”，因此“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1-p2683~2685]

与报告书中相比，李顿在书信和日记中对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所表达的看法更为直率，语气也更为尖锐。如他在东北调查时写道：

没有人打算干涉你或者强制你，但是你不能逃脱你自己行动的报应。现在你尽量用谎言诓骗世界。当我们的报告发表时，事实会水落石出。如果你坚持你现在的立场，你准备好要付出代价了吗？如果你能承担这一代价，你可以用武力来控制满洲，但是你却不能强制打开中国市场。如果这市场对你关闭了，满洲对你有什么用呢？没有一个国家打算用战争制服你，但是你付得起失去世界其余国家支持的代价吗？但如果你对后果已做好准备——请继续。如果你想要和平，如果你想和你的邻居以及世界上其余国家友好相处，我们能告诉你要在哪些方面做些什么。（信，1932.5.15）

显然，李顿对日本以武力解决东北问题是予以谴责的，认为如果它坚持这一做法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不过这一态度在此后有些变化。7月，国联调查团第二次赴日。闻知日本即将承认伪“满洲国”的消息，李顿在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两次会面时都提出这一问题。第一次会面后，李顿在给其妻子的信中写到：“他的态度是毫不妥协，他甚至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无论别人怎么想，日本都将承认满洲国，她（指日本）甚至不会告诉其他大国这样做的意图，她认为这是自己的事情，不必和中国或者别的国家讨论。我们毫无选择，只有另寻对策。”（信，1932.7.13）“另寻对策”的结果是，李顿在第二次与内田会谈时表示，有关日本承认“满洲国”，“在程序问题上仍有讨论的余地”，并请求日本政府无论作出什么决定，“至少在采取行动前应通知华盛顿条约的其他签字国。”（信，1932.7.14）

李顿与内田的会谈表明，华盛顿体系是他考虑中日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他对日本侵略行为

的谴责主要出于这一考虑,而不是出于维护中国主权的考虑。因此,他向妻子这样表示:

我从没希望说服日本人“放弃”统治满洲的欲望。我仅想让他们考虑“使用的手段”,就像亚历山大所说的那样。如果他们愿意采用世界公认的方式,我认为他们能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同时也能得到和平。但是如果他们坚持自己做事的方式,他们不可能得到和平,尽管现在没人能够或者愿意阻止他们。如果他们以这种方式占领满洲,我认为从长远来看,那将证明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帝国掘坟墓。如果他们接受我们将给他们的东西,他们有望得到想要的果实。(信,1932.6.23)

在李顿看来,日本“统治满洲”的现实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以日本已采用的武力手段,而应该以一种“世界公认的方式”,这样,国联或者说西方列强与日本在中国的东北问题上就有可能取得妥协。对这一“世界公认的方式”,李顿在其所写的《满洲:下一步》的笔记中有详尽的阐述:

现在的危险并不是由中国还是日本来控制满洲未来的命运,而是人们是保护还是牺牲那些维护国家之间和平与正义的集体责任的原则。那些坚持必须牢记现状的人应该铭记这一点。日本海军和陆军力量的强大,中国的相对虚弱,满洲现存的日本军队,满洲国的存在,中国现阶段混乱状况或中国政治的演变,对日本而言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中国联合抵制日本贸易产生的损害效应——所有这些都是现实情况,调查团没有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但是,另一类现实情况同样不可忽视,即,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盟约、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的存在。……

我们调查团反复被告知,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为了获取他们现在宣称的在那里的权益,日本在这块土地上已经进行过两次战争。为此,日本失去了20万人,花费了10亿日元的代价。这些历史联系已经根植于每个日本人的心中,日本对任何外界干涉他们宣称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都很敏感。我们接受了这些,并在我们的调查报告中有详细记载,但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提醒日本外务大臣,其他做出更大牺牲的国家,他们也高度重视并同样决心捍卫的是维护和平的集体责任机制。对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做出巨大牺牲的人们来说,国联就是现代文明的“生命线”。^①

李顿认为,东北问题的解决应该考虑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和历史联系、日本在东北的军队以及日本强大中国虚弱等现实因素,但是维护华盛顿体系和国际联盟的机制更为重要,只有在这一框架里日本的利益才能予以考虑。这就是李顿对处理“中日争端”的基本立场,并且反映在他所起草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但与报告书相比,李顿在其私人文书中更强调华盛顿体系和国际联盟。而所谓“维护和平的集体责任机制”的华盛顿体系和国际联盟,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它维护的首先是列强间的利益及它们间的均势与协调。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李顿既对日本侵华行为予以一定的谴责,又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日本通过侵略手段获得的在华权益。他对日本侵华所持的这种矛盾态度在当时西方列强中有相当的代表性,也正是华盛顿体系内在矛盾的反映。

二、李顿对国联调查团及报告书的看法

国联调查团是根据国联行政院1931年12月10日的决议派遣的。该决议对调查团的任务确定为:“就地研究任何影响国际关系而有扰乱中日两国和平或和平所维系之谅解之虞者,并报告于行政院。”^[2-p331] 国联调查团据此对自己的角色确定为:“一、审查中日间之争议(包括此项争议之原因发展及在调查时之现状)。二、考虑中日争议之可能的解决办法(务须对于两国之根本利益予以调和)。”^[2-p344] 也就是既要调查事件真相,也要找到调和两国间争议的办法,并报告国联行政院。

李顿也是基于上述认识率领调查团开始在中日两国活动的。1932年3月1日,李顿在东京日

^① 《满洲:下一步》,未注明日期,但从内容看,在报告书发表后。

本首相犬养毅为调查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答词时表示：“吾人所受命者，原非止于判断相反之主张与意见而已，苟如此则留在日内瓦即可应命。又吾人此行亦非仅为事实真相之调查，此项任务委诸事件发生当地之中立国观察员足亦。因此，吾人之任务，厥在究明此次纷争之根本原因，调查构成事实背景之事态；可能时，藉联盟之援助找出日华两国间之永久友好之基础。”^[3-p2645] 3月28日，李顿在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为调查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答词时也表示：“闻贵院长云，中国人民只有一愿望，即愿保持领土行政之完整，鄙人今敢立即保证，无论国联如何之解决，要必依此点为一条件，良以国联决不能强其会员国提出任何与各该国条约上所负义务相冲突之办法也，在上述条件之下，国联特派敝团前来贵国，其任务在于国联权利范围内尽量帮助且保证获得一公正不偏之判断焉。”^[3-p2653] 在这两次答词中尤其在日本的答词中，对调查团的任务，李顿在阐明调查事实的基础上，显然更强调找到调和中日两国的办法，要“获得一公正不偏之判断”，“找出日华两国间之永久友好之基础”，并对此任务显示出相当的信心。

国联调查团的调查与起草报告书的工作是繁重和复杂的，最初一段时间李顿对此基本上还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3月在上海时他认为：“我对事件的了解越深入，我感觉它越难解决。某一天我们得到一线希望，第二天这个希望就会被粉碎，但是也许在我们调查结束的时候，某些切实可行的东西可能会显现。”4月在赴东北前他认为：“如何从如此多的谎言中鉴别出真相，如何从千钧一发的风暴中建立和平的基础，是我们的问题。我相信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但是压力太大了。”（信，3.24，4.16）

但随着对日本侵略立场的进一步了解，李顿相对乐观的态度发生了变化。6月初在东北调查结束返回北京后，李顿告诉其妻子：“我认为我们不能说服日本人同意任何事，但是我们至少能告诉他们无情的事实，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继续坚持占有使用武力而获得的一切而不管世界舆论，他们必须付出代价。”（信，1932.6.7）他强调的已是调查或公布事实，而不是让日本人同意或接受调解。

7月初李顿及调查团成员再赴日本。临行前，李顿写道：“如果他们承认满洲国，我们去那里也无用，因为已经没有可以讨论的东西。我们去那里，仅仅是听听他们亲自所说的理由，这将是一个非常短暂也非常糟糕的访问。”（信，1932.6.23）在日本期间，李顿发现日本政府对调查团报告书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最好还是待在北京，写我们的报告，因为日本政府对我们的看法根本没有兴趣。他们甚至没有问我们一个关于调查或者中国态度的问题。他们非常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他们不关心中国的态度怎样，他们不打算和任何国家讨论满洲问题，包括中国。他们也不太关心我们的报告。这就是和平缔造者的共同命运。”（信，7.14）

报告书的起草工作主要由李顿承担：“我必须替其他委员做全部的起草工作，他们仅仅讨论和纠正我的报告。还让我做大量的执笔工作。”^① 尽管李顿在报告书中还是重申“必须从事于调解之切实努力”，而说明事实真相“仅为一部分之工作，且非最重要部分”^[3-p2691]，但由于已经认识到日本政府对调查团及报告书并不看重，因此实际上他自己对报告书已没有那样的期望了，对在中日间进行调解已失去了信心。而在报告书发表后，中国朝野和舆论对报告书也多有批评，如胡汉民认为，报告书从根本上讲绝无必要，“以我人过去一年来之经验，不能不认国联处置东北事变之手段为失当，国联调查团之报告书为无聊。”^[3-p2761] 面对这种两面不讨好的境遇，李顿在笔记中写道：

我们并不期望我们的报告能激起中国或日本的兴趣。我们相信，无论是我们的建议还是其他人的建议，都不可能使满洲问题立即获得永久性的解决。

与此相关，李顿对国联调查团所能发挥作用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调查报告书在新闻界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但时事评论家总是不能正确评价调查团的

① 李顿致其妻子信，6月15日。报告书发表后，《申报》评论说：“此报告书，乃国联主持下团体所发表之最可注意文件，叙事立言，审慎温和，文字文雅，显有英人风格，察其词句，似处处皆有李顿手笔。”《申报》1932年10月4日。

作用。许多记者要么肯定地要么遗憾地报道说,调查团已发现日本的“罪行”。调查团并没有做这类事情。他们不是法庭,他们既不是法官,也不是陪审团。用一种法庭的语言来说,他们的作用仅仅是个证人而已。他们提供了证据,本案仍待国联裁决。日本有权出庭陈述,中国亦如此。《满洲:下一步》)

李顿刚抵达远东时强调要“藉联盟之援助找出日华两国间之永久友好之基础”,在报告书中还表示要“考虑中日争议之可能的解决办法”,实际上期望能在中日两国间充当调停人并解决中日争端。但此处李顿强调调查团仅仅是一个“证人”,而不是法官也不是陪审团^①。也就是说,调查团的任务或责任仅仅是提供证据(有关事件的真相),而并无调停并解决争端(充当法官)的责任,透露出他对日本无视报告书而中国舆论又批评报告书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从李顿看法的这一变化,不难看出他对自己远东之行的失望,并且也已经认识到报告书难以发挥实际的作用。

其实,对于仅仅充当一个“证人”,李顿是于心不甘的。他在获悉自己在给国内的信中所表达的对中日事件的看法得到外交大臣西蒙的赞赏时,就显得十分高兴,并且还希望将他所表达的意见转述给英国国王和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虽然在与陈友仁会面时,针对陈友仁“你们全是你们国家利益的代表者”的话,李顿强调“我们仅代表国联”^②。可以说,在李顿看来,他的中国之行,不仅应当为国联找到解决中日事件的办法,还应为英国甚至美国的远东政策提供咨询。

三、李顿眼中的中国与中国人和日本与日本人

李顿在中国期间与中国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有广泛的接触,他在书信和日记中对此有大量记述,并包含了他对中国的一些观察。这些记述不仅展现了像李顿这样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使我们得以了解李顿眼中的中国人以及这些中国人向李顿所表达的他们对时局的看法。

李顿到中国后不久,在将中国与日本作比较时写道:

相反的是中国人不切实际。他们仅仅在幻觉中生活,迄今为止他们没为我们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建议。他们非常可怜,像孩子一样,总是故作姿态,憎恨强权和控制,但是离开它又不能做任何事。现在他们非常伤心,而且非常生气,因为他们被羞辱了。几乎所有国家都曾经伤害了他们,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朋友。当他们温顺的时候,他们受到关照和庇护,当他们桀骜不驯的时候,他们受到惩罚。他们将两者都吞咽下去了。但是中国已开始觉醒并在激励自己。她对国联这一新朋友有一朦胧的希望,认为它比过去任何一个向她讲友谊的国家会给她更大帮助,但是她几乎不信任任何人,正开始认识到她必须自强,否则就要灭亡。(信,3.24)

在这里,李顿显示出一种近代以来典型的西方人对中国居高临下的轻蔑态度。不过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广阔国土的国家,李顿也流露出因对其了解甚少而产生的困惑。9月4日,在乘坐张学良的飞机从北京飞往上海途中,俯瞰大江南北时,李顿十分感叹:

我正俯瞰的这个国家,我们真正了解了多少?或者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国联盟约或九国公约又了解了多少?那天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这个西至克什米尔、北达蒙古沙漠的国家的一小部分。印度看上去是个拥有3亿人口的大国,而中国却是个拥有4亿多人口的庞大国家。哪里是开始?哪里是结束?(日记,1932.9.4)

李顿在观察中国和中国人时,对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和他所接触的具体的中国人是有所区分的,就在上述那段对中国持轻蔑态度的文字中,他写道:“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为其他各国所讨厌,但

① 将国联调查团视为法官或陪审团那样的角色是当时较普遍的看法,如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就将调查团看作陪审团(格鲁:《使日十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4页),而中国政府实际上更多地期望调查团能起法官的作用。

② 李顿致其妻子信,7月23日、3月25日。在7月23日的信中,李顿还提到给西蒙发过很长的电报。

是单个的中国人受到与他们共处和认识他们的人的喜欢。他们如此和蔼，孩子般的天真，仁慈，但是又如此胆怯！”让我们看看李顿是如何记述他所接触的“单个的中国人”的。

3月27日至4月1日，李顿及国联调查团成员在南京逗留了6天，其间他与蒋介石、汪精卫等多次会面包括正式的会谈，而在他的日记中对蒋介石的记述最多。3月28日，李顿礼节性拜访蒋介石，这是他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当天李顿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蒋介石的最初印象：

我们拜访的第三个对象是蒋介石将军，他住在城外的夏日别墅里。我们会谈时，蒋夫人也在场。……将军是个非常奇特的人。尽管是中国军队的总司令，但他的穿着像个囚犯。剃着光头，穿着紧身的咔叽布料的短上衣，衣服上没有任何军衔的标志，甚至连一个炫耀的纽扣都没有，脚上穿了一双黑色的浅口鞋子。总司令生活简朴，非常信奉禁欲主义，但他可能是当今中国最伟大的军事领导者。他还相当年轻，而且经常作为中国最可能的独裁者被谈及。（日记，1932.3.28）

3月30日，蒋介石在其寓所设宴以鱼翅、燕窝、海鲜等佳肴款待国联调查团。3月31日晚上，李顿再赴蒋介石寓所，与蒋介石、汪精卫和外交部长罗文干会谈，由顾维钧做翻译：

他们问我有关上海的情况。我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在抵制圆桌会议上犯了错误，我建议他们接受这个会议，并且尽可能接受会议的议程，但以日本撤军作为会议召开的条件。然后他们问我，我们在东京时，对日本人的态度有什么样的印象。我回答说，他们似乎没有什么新的要求，但是他们已经表达出他们的决心，他们决不会放弃在前两次战争中所获得的一切。他们坚持要求履行所有现存条约的义务。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保证他们获得这些，他们欢迎国联的帮助。但是，他们决不会接受任何减少我们现有权利的决议。（日记，1932.3.31）

4月1日晚上，根据李顿的意愿，英国驻华使馆官员英格拉姆安排他与蒋介石又进行了一次单独的会谈。宋美龄担任两人间的翻译。会谈的话题集中在中国对国联以及对东北问题的政策。李顿向蒋介石表示：“我非常担忧中国目前政府的稳定，并担心，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影响日本的话，中国政府是否愿与日本和解。”李顿关注的是中国对国联的态度以及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动是否会影响它的态度。对此，蒋介石向李顿保证：“当今中国任何一个政府都将采取继续与国联积极合作的政策”，“无论任何政府都不能生存在其他基础上。”对于李顿有关中国对东北问题最看重什么的提问，蒋介石答道：“维护中国的领土与主权。你们到满洲后，如果对日本扶持的傀儡政府不予任何形式的承认，那么你们的工作就完成了一半。因为那时我们会相信国联的诚意，并接受国联的任何建议。”表明了国民政府对东北问题和对国联态度的底线。蒋介石还表示，中国政府会派警察去维持东北的秩序，并新建一个有效的地方政府，也愿意接受外国顾问的帮助。有意思的是，在会谈结束时，宋美龄给李顿讲了《春秋》中楚、宋两国交战的故事：被围的宋国士兵告诉楚国士兵他们已经弹尽粮绝，如果继续被围三天将不得不投降。而围城的楚国士兵则告诉宋国士兵他们也已筋疲力尽，如果对方再坚持三天，他们将不得不撤退。双方士兵的坦诚导致各自的将领了解真相后宣布停战，并签订了和约。宋美龄告诉李顿：“你对我们如此真诚和信任，我们觉得必须以诚相待。所以，将军让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而李顿则对这种充满东方智慧的方式感到十分困惑：

我绞尽脑汁思索这个寓言故事的真实含义。实际上，在这次会谈中，我们没有一方是特别真诚的。总之，在我来之前，他们已经协商好告诉我这个故事了。在下午同部长们的会谈中，他们明显不真诚，他们的谎言捉襟见肘，所以蒋夫人的解释不会是真心话。我感到，将军想要告诉我的和不能直接告诉我的事情，都寓于那个故事之中。那是什么呢？（日记，1932.4.1）

与对蒋介石的大量记述相比，李顿对汪精卫的记述就显得相当简略，尽管他与汪精卫也有多次

会面^①。李顿对汪精卫的第一印象是：

他是个非常风趣的人，看上去大约35岁。但有人告诉我，实际上他将近50岁了。他穿着得体，身着黑蓝色的丝绸衣服，有着诗人般的头脑和运动员般的体格，看上去非常温和，具有迷人的魅力。但是在早期的革命中，他曾试图用炸弹暗杀过摄政正，为此被囚禁了三年。很明显，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并且是个精力充沛做事果断的人。（日记，1932.3.28）

对于汪精卫在与国联调查团会谈中的表现，李顿以一种赞赏的口吻写道：“他不知道我们打算问他什么问题，可是他没有任何踌躇地回答全部问题，一个内阁成员只有在任五或六年后才能做到这点。”（信，4.2）9月4日，离华前夕李顿与汪精卫在上海最后一次会面。汪精卫以及宋子文询问李顿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如果日本承认“满洲国”，中国是否应该与日本断绝关系？是否应该修复与俄国的关系？是否应该抵制日本对热河的侵犯？如何处理共产党问题？对这些询问李顿的反应是：“能对此贡献一得之见，我感到受宠若惊。难道不奇怪吗？这是中国的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向我咨询有关中国重要国策的看法，而在6个月前他们从未见过或听说过我。这也表明，只要赢得他们的信任，并且不对他们发号施令，引导和帮助这些人是多么得容易。”（日记，1932.9.4）

李顿与宋子文在他刚到上海时就已有多次会面。宋子文曾两次带上海警察局长见李顿，详细介绍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的真相。对宋子文，李顿认为他“是最迷人的一个人，并且，我想我们会相处得很好”，“他反应快，而且思路清楚，容易沟通。他向我描述了现行政府的基本架构和国民党与各部长之间的关系。中国像意大利一样只有一个政党。法西斯党和国民党在这两个国家都非常有势力，但实际上政府的运作却是不同的，中国的政府系统更像苏联。”（信，3.20，3.22）

李顿在其信件和日记中提到的中国人还有张学良、吴佩孚、陈友仁、胡适、丁文江、史量才等人。就其记述的篇幅和主观性判断而言，李顿对蒋介石最为关注，尽管蒋介石并不是他会面最多的人，这表明他明白在国民政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蒋介石。

李顿率调查团抵达中国前先到日本，在中国起草报告书期间又到日本半个月，而在华期间与日本官员也有许多接触，因此他在信件和日记中有不少有关日本和日本人的记述。他认为：

日本人是非常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尽管他们像中国人一样能撒谎，并且他们的宣传也是完全错误的，但他们的头脑中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知道他们反对什么。他们不允许满洲回到像中国其余地方那样混乱的状态，他们也不想再一次同俄国作战。（信，3.24）

李顿在他的书信中不止一次地将日本人比作普鲁士人，“他们的思维方法纯粹是普鲁士人的，当他们处在弱者地位的时候，他们相信恐吓是一种保持措施。”（信，3.21，3.24）而在高傲的英国人眼中，普鲁士人意味着思维简单、崇尚武力并信奉以强权夺取利益。

国联调查团在东北期间，处处受到日本占领当局严密的监视。李顿告诉他妻子：“我们在这里的第一个星期是一个恶梦。日本人非常多疑。我们被迫接受‘保护’，我们实际上被看作囚犯。”他还特地记述了日本人对调查团进行监视的一个事例：某日调查团中方参议萧先生与一德国记者去见调查团另一名中方助手严先生，他们刚进严先生的房间，一日本人就闯进来意欲监视他们的谈话。萧、严两人以英语与德国记者交谈，那日本人竟要他们将所说内容翻给他听，遭到拒绝后日本人说：“我必须去叫一个懂英语的译员，在我回来之前你们什么也不要说。”李顿的评论是：“这件事发噱地显示了日本人的方式。”^②字里行间不难发现对日本人僵硬的普鲁士方式的嘲笑。另一方面，李顿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又抱有一丝敬意。当一个日本人告诉他，一二八事变时有三个日本士

① 3月29日至4月1日间李顿与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共有正式四次会谈。会谈中，中国方面主要由行政院长汪精卫表明立场。这四次会谈记录见《顾维钧文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第5盒。

② 李顿致其妻子信，4月28日。顾维钧在随调查团赴东三省调查经过报告书也提到此事，但两者日期并不一致，见《革命文献》第40辑第2721—2722页。

兵身绑炸药去炸毁充当路障的铁丝网时,李顿认为:“只要你们有这样英勇的士兵,你们的军队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军队匹敌。”(信,5.19)

但李顿与日本方面接触越多,他对日本人的负面看法和评价也越多。7月上旬,李顿在起草报告书期间再赴日本,此时他对日本已不像3月初那样抱有希望了。“我认为我们和日本政府的会谈不会取得很大成果。他们不敢告诉他们人民事情的真相”,“他们还继续告诉我们愚蠢的故事,还以为我们像上次来时那样对事情一无所知,现在实际上我们比所有人都了解这件事。”(信,7.10)在日本期间,李顿与刚任外相的内田康哉举行了会谈。在当时动荡的日本政坛,内田在对华问题上属于强硬派,主张立即承认伪满洲国。李顿在与内田第一次会谈后写道:“他的态度是毫不妥协的。他甚至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无论别人怎么想,日本都将承认满洲国。她(指日本)甚至不会告诉其他大国她这样做的意图。她认为这是她自己的事情,不必和中国或者别的国家讨论。”(信,7.13)在与内田第二次会谈中,李顿反复强调华盛顿体系和国联机制必须维护,但是内田“非常顽固,而且粗鲁,尽管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他说日本政府很满意他们没有违反‘华盛顿条约’,并且也没有和其他大国交流的意图。他们对要做的事情已经下定了决心,不会在乎其他大国的想法。我要求他至少要把我们的观点传达给他政府中的同事,他回答说连这点也不愿意做!”(信,7.14)

李顿对日本的崇尚武力与外交上的蛮横态度抱有一种敬畏与讨厌交织的心情。如果将李顿对中日两国的看法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他的同情在中国这一边。

李顿文件由于其私人性质,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相比,更率直地表达了李顿本人对中日冲突和两国的看法。在这些信件和日记中,李顿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有尖锐的抨击与谴责,对中国虽往往以高人一等的姿态俯视之,基本上还是持同情的态度。对国联调查团及报告书所能发挥的作用,李顿的看法前后有一变化,反映了他对国联及调查团的角色认定与远东国际政治现实之间的差异。而对整个中日问题,李顿还是将维护大国利益和力量均势的华盛顿体系与国联机制放在首位。

[参 考 文 献]

- [1]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R].载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Z].(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再版),第40辑.
- [2]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Z].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第一册.
- [3]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Z].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再版,第40辑.

Lytton's Trip to China As Seen in "Lytton Documents"

Jin Guang-yao Zhu Li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at the League of Nations sent an inquiry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was a significant event during the Far East crisis in the 1930s. During his stay in China, Victor Robert Lytton, chairman of the commission, sent many letters to his family and kept a diary. The unpublished letters and diary, which amount to over 80 thousand words, recorded Lytton's view of Japanese aggression upon Northeast China and his conversations with Chiang Kai-shek, Wang Jing-wei, T. V. Soong and Japanese leaders, which, as compared with "The Commission's Report",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study of the Commission and particularly Lytton himself.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unpublished documents, is intended to review Lytton's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his view of Chinese-Japanese relation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Lytton's mission.

Key Words: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the Inquiry Commiss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Lytton

[责任编辑 周 珉]